

战 时 札 记

〔苏〕符·柯切托夫 著

王庚虎 魏 华 卢坤纾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Всеволод Кочетов
ЗАПИСИ ВОЕННЫХ ЛЕТ
Моск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8

战 时 札 记

〔苏〕符·柯切托夫 著
王庚虎 魏 华 卢坤纾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146,000字
1983年7月第一版 1983年7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500册

统一书号：7203·049 定价：0.60元

译者序

柯切托夫(一九一二——一九七三)，苏联著名作家，新闻工作者。他的主要作品，译成中文的有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落角》、《你到底要什么》和《青春常在》等。

他当过《祖国战线报》、《列宁格勒真理报》和《真理报》记者，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写过许多通讯和报道。用特写作武器，歌颂人民，打击敌人，在他的新闻活动中占有重要的一页。

《战时札记》是纪念碑式的作品，是他特写创作的高峰。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一月号的《十月》杂志上。后经作者修改，于一九六四年，由军事出版社出版，同中短篇小说编在一起，题为《前线时期》。一九六五年，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了《战时札记》单行本。一九七六年，收入《柯切托夫全集》第六卷。一九七八年，又出了单行本。

《战时札记》，是同一主题，各自独立成篇的特写汇集。包括《地平线上的余辉》、《列宁格勒周围越来越紧迫》、《在包围圈里》、《大后方》、《你同谁一起去侦察》共六篇。本书选译其中的两篇，即《地平线上的余辉》和《大后方》，反映了列宁格勒保卫战的不同侧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我热爱新闻工作》，是《你同谁一起去侦察》中的一节。这一篇，在所有的单行本中，都是单独成文，

由编者加了标题。这一篇反映的内容，从时间顺序上讲，晚于本书其他两篇。一九八二年，苏联《新闻工作者》杂志，就以重新发表这篇文章，作为对作者逝世九周年的纪念。我们这个译本，把它列为首篇。

《战时札记》的内容，基本上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描绘和歌颂列宁格勒人民反法西斯的英勇斗争，二是回忆和思考自己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

读《战时札记》，深感作家视野的开阔。他把军事战线同其他战线联系起来，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在广阔的生活画面上，表现战争，表现人民，笔端饱蘸生活的真实，在矛盾冲突中写了人物的命运和性格，给读者以真实、朴素、亲切、感人的深刻印象。

特写，从根本上讲，是属于新闻范畴。把特写赋予以“生活教科书”作用的是高尔基。高尔基是公认的特写创作的理论家 and 实践家。在他的教导和培养下，苏联新闻界涌现出一大批才气横溢的特写作家。柯切托夫就是突出的一位。了解一下他的《战时札记》，单从特写创作这一角度出发，对于我们的新闻工作者来说，也是不无补益的。

王庚虎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北京。

目 次

1	我热爱新闻工作
13	地平线上的余辉
109	大后方

我热爱新闻工作

我躺在军医院的三楼上。这座大楼位于红色学员路。战前好多年，许多军事飞行干部都是在这里培养的。

马路对面，有一家小工厂，也是从事军工的。从院子的深处，不时传出震耳欲聋的嘈杂声。光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这家小工厂正在修理摩托车。直到昨天以前，大门口还设着门卫岗亭。一颗重型炸弹掉下来，警卫同岗亭都不见了。这是昨天的事。爆炸的气浪也冲击到我们病房的窗户上。玻璃震碎了，落得病床上到处都是。

在遭受炮击的时候，许多“能走的人”都到地下室、防空洞去了。非这样做不可，这是命令。凡不能走动的，都用担架抬下去。可是，许多人又从防空洞跑了出来。因为就在几天以前，德国的炸弹穿透了大楼的基脚，地下室也不能呆了。

久经战阵的军人，一心向往着掩蔽部、堑壕，甚至开阔的田野。那里，可以钻进水渠或者弹坑里，并且总能看出，炸弹是否朝着你飞来。而这里，你躺在病床上，每一次都以为炸弹是往你头上甩。主要是，没有一块可信而牢靠的土地能够不出卖你，救你，保护你。在这里，你只能担惊受怕。

德军在斯特列利地区或者别兹查波特村，配备有远射程炮。因此，我们一天会两三次地听到沉闷的炮声。炸弹的呼啸声，爆炸的震动声，常常仿佛就在我们身边。显然，无论是大型军医院

也好，还是修理摩托车的工厂也好，对于飞机或者坦克来说，都是极端诱人的目标。再说，列宁格勒已被围了十个月，敌人企图利用围困法攻取它。在他们的地图上，军医院、工厂都是特别标出来的。这些地方自然会首当其害。

我在军医院住院，是在战争发生一周年之后，也只有几天时间。事情是这样的：

我当时担任《祖国战线报》前线生活专栏的编辑。有一天，编辑部秘书卡列林大尉，突然叫到我那里去。他住在十月二十五日大街一个窄小阴暗的屋子里，只有一个窗户。烟草的烟雾，灰濛濛的，不断在空中舞动着。我们这位秘书烟瘾很大。桌子上，稿件上，清样上，到处都放着干烟叶。他的各个抽屉，也都塞满了烟丝和烟叶。他会用螺丝刀卷烟，一次卷两支，边卷边抽。他正在忙着改稿子，一面改，一面小声念着，两眼始终看着稿子。就连我走进去，他也不肯把头抬一下。

“柯切托夫同志，”他说，同时大笔一挥，不知什么人写的文章中，一大段就被删掉了。“您在《列宁格勒真理报》工作期间，曾经到过民兵部队。您写的关于民兵的通讯报道，我都看过。后天是人民民兵成立一周年。应当给本报写一篇有份量的文章，说明民兵出身的红军干部战士和指战员的成长过程。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题材。拟发在七月三日的报纸上。也就是说，明天就得交稿，最迟不得超过中午。”

“多大篇幅？大尉同志。”

“篇幅不受限制。意写多少就写多少。只是要好。”

我顺手牵羊，拿了他一把烟叶。还好，表情严肃的大尉，正全神贯注地划掉文章中的另外一些段落，并没有发觉。于是，我便到前线司令部各部门去了，想打听清楚，一九四一年七月，以人

民兵兵师的名义组成的部队，此刻正在哪里。总而言之，需要先弄清楚，这些部队是否保留下来了，因为在冬季封锁时期那艰苦的月份，我和人民民兵师第二师的朋友们已失掉了联系。

人们告诉我，从前的民兵正在乌里茨克布防，它的司令部机关如今在弗列里医院所在地区。我只有到那里去，才能找到答案。

修复好了的电车把我几乎送到基洛夫工厂门口，接着到弗列里医院的道路就要靠我步行了。尔后，从师部到团部，从团部到营观察所，再到列宁格勒至加特奇纳市波罗的海车站附近死气沉沉的铁路路基的土窑洞，就都得步行了。在营里，人们告诉我，如果顺着泥炭草地走（草地上长满了爆炸柳和璎珞柏），就可以差不多直接到达乌里茨克附近。在观察所的前沿地带，我找到了一个好小伙子，炮兵，战前在普希金诺修理自来水设备，现在是上尉，第七十六炮兵连连长，勋章获得者，山鹰。

给我派的向导或者红军通讯员是一位红军小战士。他头发是白的，眼睛是蓝的，个子仅有我肩膀高。脸儿善良，温顺，年轻，长着不少雀斑。从外表看，不大象军人。我同他走了很长一段路程。时而弯着腰，在水渠中间奔跑；时而用人类早已忘记的运动方式，即伸开四肢在灌木丛中爬行；到了开阔的地方则匍匐前进，沿路这种地方并不少。“好哇，”我想。“这个节日好在是七月，要是放在我们列宁格勒雨雪泥泞的十一月，那才好受呢！”通讯员擦着脸上的汗水说：“指挥员同志，您干吗要白天到观察所去呢？我们这儿，一般都是在夜间联系。那样比较安全些。”

我把卡列林大尉交给我的任务向他作了简短的说明。要完成这一任务，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等到夜间再来搞，说什么也是不行的。明天上午，文章就得写好，送印刷厂排字。

“既然这样，那就应当在昨天，或者前天，再或者一周以前搞呀。”通讯员红着脸说。

“报纸……”我含含糊糊地解释说。“有它自己的规律啊！”

我这么说，同时也不由得想起了报社编辑部的生活“规律”。它对于任何一个局外人来说，都是不可理解的，简直有点杂乱无章，荒诞不经。最令人惊奇的，莫过于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规律。或者再确切一些，即使有这么个规律，也是独一无二的。虽未经明文规定，但必须遵守。这个规律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文章则必须按时交出来。为此，你将会连着几天几夜不能睡觉；你得徒步行走几十公里乃至上百公里；你不能参加某个朋友十分重要的命名日，而由此则会引起家庭不和；你也可能迷路，饿着肚子，连着几昼夜在同一个地方转来转去。如果是冬天，脚和鼻子都会冻坏。你也会同人吵架，而你压根儿就不想吵架；总之，只要你没有完成任务，就会有许多罪受。这就是规律。既然它对你如此严格，你又不满意它，干脆离开报社，找个别的职业干，不就完了。可是你不，你舍不得，你就喜欢当一个新闻记者，一个报人。看来，真拿你没有办法。可能，你将来会在报社担任个什么行政职务，那你就不是新闻记者了，而是新闻官了。这个地位当然是很阔的，令人艳羡。比方说，行走坐的是专车；买东西可以到别人不能进的商店去；什么戏院呀，运动会呀，都会给你发特殊入场卷；凡召开全市性的会议，主席团的位子总给你留着；你对生活对自己简直满意极了。与此同时，在内心深处……也会更加嫉妒那些真正的新闻记者，怀着恶意，一点也不肯通融，丝毫不肯怜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新闻记者，而你不是。

唉，难道我可以把我想到的这一切，都讲给我的向导听吗？

炮兵观察所的掩蔽部，设在上半截已经干涸的水渠侧壁处，同战线平行。水渠很深，积水不到沟深的四分之一，如果靴子不进水，那么可以在渠中从左到右走得很远。穿过水渠到观察所掩蔽部门口有一个小桥，是用木材搭成的。

观察所的主人是一位上尉。他很热情地欢迎我们来，用泡在热水瓶里的茶水招待我们。通讯员不想喝茶，坐在屋角的炮弹箱子上，呼呼地打起鼾来。这些炮弹箱都是夜间不知从哪里运来的。在掩蔽部，它们充当椅子、桌子、床铺用，这也就是掩蔽部的家具。只见通讯员两腿夹着步枪，头倚在枪身上睡着了。

我在采访本上，记下了炮兵营长的身世，他的战斗历程。战争爆发后，自愿参加民兵。在短期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当上了炮兵。他的炮打得准不准？这还用说！战斗中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故事？肯定不少。但是，最好还是不要把这些都写出来。有趣的故事用不着。太阳已经落山了，天色慢慢地转暗，一点点直观的东西我还没有找到呢。他备有三发炮弹，这些炮弹今天将要根据他的观测结果来使用。

在掩蔽部的了望孔上，搭成一个用雨衣做成的帐篷（否则，德军观察兵就会发现我方了望孔上的玻璃闪光），营长坐在靠近剪形镜的地方。

天一黑，他们就会行动，在那面，乌里茨克。步兵。骑兵。步兵对我们无所谓。但是，向四轮大车、货车开炮还是可以。有一辆货车，套一匹白马，我们已经观察它好几天了。不知道运的是什么东西。可能是给养。也可能是弹药。瞧，就在那条路上……

我也顺着剪形镜看去。街道看得清清楚楚。我那么熟悉的乌里茨克的大楼呀，里科沃火车站呀，就连铁路路基那面的道路也

清晰可见。那辆白马拉的货车，一会儿就要顺着这条路过来。我看见几名德国兵正在房屋之间悠闲地散步。在一家院子里，有一堆劈柴。另一家院子里晾着一件内衣。奇怪的是，这样好象在窥视别人隐私似的。大概，那些希特勒分子也通过他们的观察所往这边看。我们在这边水渠和灌木丛中走路的情景，他们也能观察到……

炮兵营长本想把炮弹放出去，对准那砖楼的窗户，因为他看见里面有人。可是正在这时候，我们期待已久的那辆白马拉的货车终于出现了。是的，我也看见了。我看见了那匹白马。货车上全是箱子。有两个赶车的。

炮手们高兴了。营长命令“一、二、三，放！”电话员把命令传到炮火阵地。不到一分钟，便听见身后轰隆一声巨响……

炮弹在路上爆炸了，正好落在货车的旁边。那匹白马受惊了，赶车的使劲拉着缰绳，不让马跑。第二发炮弹落下来，或者直接掉到马车上，或者离它很近，只见破片、断片，随着爆炸的浓雾，四面乱飞。用不着怜悯什么人，也用不着怜悯什么东西，就是马也不值得怜悯。虽然我也干过农活，对于那些聪明的、有耐性的、逆来顺受的牲畜，一向怀着好感。可此刻，我心里想的只是：打得好！非常好！但愿能经常打得这么准。那样一来，我们就不必再受围困之苦了，我们也能转入进攻，把那帝国的办公厅，将军司令部，戈培尔的电台，希姆莱的盖世太保，希特勒的密室……统统干掉。

是的，我要写一篇特写，描写那位优秀的上尉。他没有白白地浪费炮弹，而这些炮弹正是饥饿的、疲累不堪的列宁格勒的妇女和大孩子备受艰辛才制造出来的。这些孩子每天早晨不是去上学，坐在课桌后面学习，而是进工厂，站在车床旁边生产。我要

写和平的人怎样成了战士。写两篇底栏专论^①。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卡列林大尉不是说过嘛，篇幅不受限制，只要好就行。

当我同向导往回走，朝着列宁格勒方向前进的时候，天色已经向晚了。太阳低垂在地面上。芬兰湾吹来的冷风，凉飕飕的。有件大衣披在身上就好了。可我们两人都穿着一身单军服。我们长长的身影映在泥炭草地上，影子在我们的前面。

周围万籁俱寂。在农村，夏天的傍晚就是这样。在我们的背后，突然响起了迫击炮的射击声。这声音打破了黄昏的宁静。接着，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颗迫击炮弹爆炸了。我们两人马上爬在地上。地面湿漉漉的，一点也不舒服，可它救了我们的命。

“这是朝什么地方打？”我问。

“谁知道。”通讯员说。“也许是朝着我们。他们的堑壕有七百米长，不会更多。他们通过望远镜或者剪形镜看见了我们……”

我刚才的推测得到了证实。每一天，每一小时，透过光学玻璃，不仅我们在窥伺德国人，德国人也在窥伺我们。现在，我同这位长满雀斑的小伙子所处的位置，恰如半个小时前，那两个赶车的人同他们的白马一样。难道我们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吗？他们绝不会向我们放一、两发炮弹了事，而是放三发、四发，以至十发。怎么可能呢？

我们没有听见新的爆炸声。于是，便小心翼翼地爬起来，弯着身子飞快地往前跑。因为开阔的草地一览无余，不容易找到隐身的地方。

突然间，第三发炮弹爆炸了。紧跟着第四发也响了。

我们只好又爬在冰冷潮湿的地面上。地面湿漉漉的，以至我

^① 指报纸版面下部登载的评论文章。——译者注

们肘部支撑的地面，都渗出水来了。

“等一会，我们跑快点。”我对通讯员说。“要不，会感冒的。”

“那不用说。”他懊恼地说。“不过，指挥员同志，我迷路了。可能左边就是铁丝网。那是地标。可是看不见。大概，我们进入我们的布雷区了。”

“那怎么办呀？”

“不知道。”

我爬在地上，四面打量了一眼。如果我们真的进入了布雷区，那怎么得了？怎样才能区别哪里埋着地雷呢？它们有什么标志呢？就这个问题，我问通讯员。

“凡埋地雷的地方，都插了一些小木橛子。”他懒洋洋地答道。“可是我看不见木橛子。您以为我是战士吗？我入伍才四个月。我是农技师。”

“农技师？！可我是农艺师！”

于是，我们爬在地上聊起来。他回忆起自己的奥洛夫希纳，三年前毕业的技校，亲爱的集体农庄。他毕业后就回到原来的集体农庄，在伏尔加河附近的村庄搞起科学实验来。尔后，他参了军。那是去年冬天的事。他们渡过冰冻的拉多加湖，到了列宁格勒……

我想，我正要写一篇和平的人怎样成为战士的特写，应该把他的遭遇写进去。明天文章就得交给秘书处，脑子里想的净是有关的材料，可我的周围却是布雷区！真是不可思议。再说，即使不存在什么布雷区，你试着站起来，迫击炮弹又准会跟着你跑。

寒气袭人。天终于黑了，再躺在地上等下去已不可能。再说，此时正是六、七月交替之机，白夜很长，黑夜反正不会来，不管你等多长时间也无用。

我们决定跑步走。于是，两人站起就跑。一面跑，一面象蚂蚁一样，把脚抬得高高的。想起来真可笑，我们以为这样就会减少踩雷的机会，就是踩上了，它在你脚下爆炸，而你却高高在上，离得很远，不一定能炸着。我还想，只要跑得快，脚掌不沾地，我们的体重就不足以触动引信，引起爆炸。

总而言之，我们就这样脚掌不沾地的，顺着草地往前跑。

背后响起了有节奏的、听不清的射击声。炸弹的呼啸声。爆炸声。我们只管跑。当又听到爆炸声离得很近的时候，我们马上卧倒。这一次，已经不是在泥炭草地上，而是在不太深的沼泽里……

此行举步维艰，可不可以描写一番呢？我想，那是不值一提的。夜半更深，我们步行经过了弗列里医院、阿夫托沃、基洛夫工厂、空无一人的斯塔切克路（我们穿着胶底鞋，沉闷的脚步声清晰可闻）、基洛夫区苏维埃旁边的广场（地面上插着许多水泥圆锥体和经过气焊处理的铁轨做的“刺猬”，以防备敌人空投），尔后，又顺着戈里鲍耶多夫水渠岸边、马克林大街、捷卡布里斯特路、马伊夫防波堤、赫尔岑路、伊萨阿基耶夫斯基大教堂、阿斯托利亚旅行社走，这才来到我们的十月二十五日大街，凭着老记性，我们管它叫涅瓦大街……

早晨六点钟，我回到编辑部。所有的人还没起床呢。只有诗人亚历山大·弗利特一人坐在编辑部接待室，因为他是值班的。他年龄已经不小了，但总是精力充沛，我们通常都叫他“弗利特爸爸”。此刻他正埋头在稿堆中，小声地念着他刚刚写好的关于玛涅尔赫姆的讽刺诗。

我走进他的寝室，躺在床铺上。我冷得浑身发抖。可是还得尽快地把从前的民兵的材料写出来。

刚写好几页，就有人叫我去参加每天在编辑部办公室召开的碰头会。

“关于由民兵成长起来的军事干部问题，由柯切托夫写篇六十行的文章就行了。”卡列林大尉在安排第二天的版面时说。

我拟议中的两篇豪华的底栏专论算是告吹了。争也没用。版样就是版样，它是由一只坚定的手画好的，而指挥这只手的又是铁的需要，即常常把最需要、最重要的材料安排到版面上去。你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报纸生活的铁的规律就是这样，它虽然未经明文规定，为外人所不理解，但却的确如此。

我把我那洋洋大观的文章删到只剩六十行。交给了秘书处。稿子被送去发排了。

可是到早晨，报纸拿来一看，上面却没有我写的那六十行。登的是不知什么人写的一篇更重要的材料。我的文章先是推迟刊登（纪念日已经过去了，为纪念日准备的材料也就没用了），尔后也就扔到字纸篓去了。接着，我也被送进了军医院。肺炎和风湿病。

在我病愈出院后，又会有新的紧急的采访任务，又会让我写六十行或三十行的文章，写好后，又可能扔到字纸篓去。尽管如此，我还是热爱新闻工作，我觉得它是蛮有趣的。